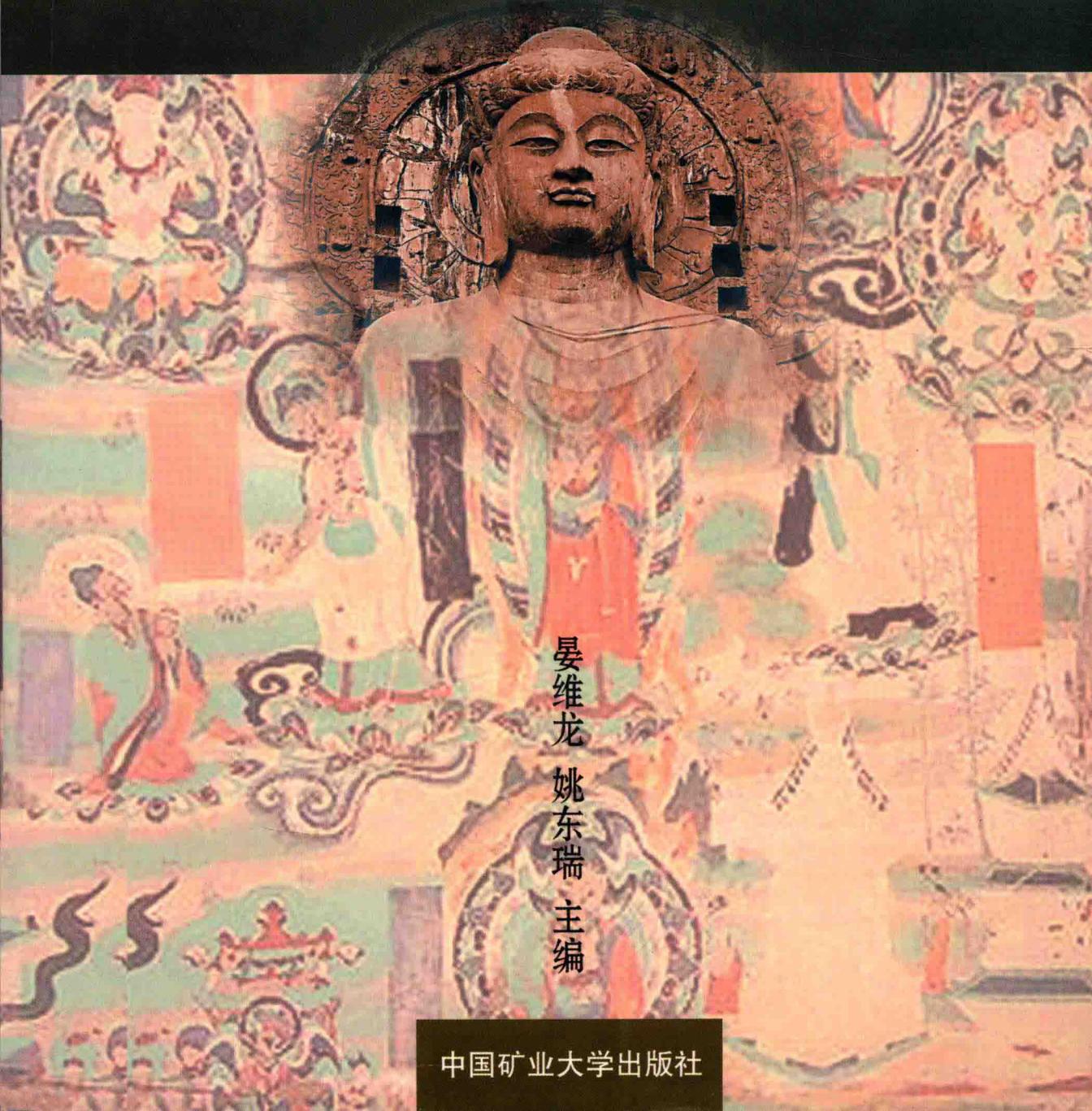


西游记文化论丛

(第1辑)



晏维龙 姚东瑞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要 要 容 内

西游记文化论丛

(第1辑)

晏维龙 姚东瑞 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西游记》学术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西游记》文化内涵、人物形象、作者、版本、主题等。论文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游记》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在《西游记》的版本和作者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同时对《西游记》的人物形象、情节、艺术风格等进行了重点研究。

本书可供《西游记》研究工作者参考,也可供广大人文社科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游记文化论丛·第1辑/晏维龙,姚东瑞主编.一徐州:中国

矿业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5646 - 0506 - 3

I. 西… II. ①晏… ②姚… III. 西游记—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888 号

书 名 西游记文化论丛(第1辑)

主 编 晏维龙 姚东瑞

责任统筹 张锐戟

责任编辑 徐习军 刘灵芝 陈振斌

责任校对 褚金红 吴海霞 秦海明 韩自波

版式设计 刘灵芝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赣榆县赣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一

萧相恺

《西游记文化论丛》终于摆在大家的面前了。

这部论丛的诞生,可谓历经曲折。回想起来,感慨颇深。事情的渊源,似乎还得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西游记》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其他几部名著一样,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82 年的秋天,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淮安县、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在淮安、连云港两地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当时从事《西游记》研究的学者,许多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真可谓郁郁乎盛矣,会后还出版了《〈西游记〉研究》一书。1986 年 11 月在浙江舟山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会上酝酿成立全国《西游记》学会,商定由陈毓黑、苏兴等先生领军,具体筹备工作则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吴圣燮、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小伟担任,秘书处(挂靠单位)准备设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而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全国《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再后来,又曾在河南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及连云港市等地多次举办国内、国际《西游记》研讨会。《西游记》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但全国性的学会却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直到 2006 年夏天,淮海工学院举办“2006 西游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学者 70 余人共聚连云港,就《西游记》的思想艺术、作者版本、文化思潮等展开了热烈讨论。为了便于交流研究信息,推动《西游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会上酝酿成立一个松散的学术沙龙式组织——“西游记论坛”。“论坛”的联络处设在淮海工学院,学者们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响应,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国庆教授亦积极报名。联络员由胡小伟、王学钩、曹炳建、蔡铁鹰、苗怀明、张锐载等诸位先生担任。2007 年,又在江苏省盱眙县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西游记》研讨会。会上,胡小伟、刘荫柏、李时人、曹炳建、王学钩、蔡铁鹰、张锐载、苗怀明等先生就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西游记论坛”(筹)进行磋商,淮海工学院副院长舒小平教授也特地从南京政协会议上专程赶赴盱眙县参加会议。同年,又在淮海工学院召开了由部分同志参加的筹备工作会议。淮海工学院主要领导全程参加了会议。会上商定,由李时人、胡小伟、刘勇强、王学钩、蔡铁鹰、曹炳建、苗怀明、张锐载等先生牵头,进行筹备。并准备于 2008 年召开全国西游记研讨会暨“西游记论坛”(筹)成立大会,且对“论坛”的工作作

了大体规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或国际学术研讨会；定期出刊“西游记论坛通讯”、继续办好《海海工学院学报》的“西游记专栏”；编辑出版西游记文化研究丛书；等等。淮海工学院每年拨专项费用作为学会正常的活动经费。

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全国性的组织“西游记论坛”的成立看来是无望了；就是要搞个“筹委会”，也颇有点唱对台戏的意味，自然很不妥当。但淮海工学院领导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推进《西游记》学术研究的决心没有变，学者们拓展深化《西游记》研究的热诚没有变。大家认为，有一个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是好事，我们可以在这个学会的领导下做一些工作。于是，在“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等一行访问连云港市期间，有关同志作了专题汇报，并与副会长、秘书长商谈，提出将“论坛”纳入学会，作为它的一个下属组织。学会领导当即口头表示同意。后来由于主观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个提议没有获得研究会其他领导的认可，原定2008年以论坛名义举办的全国西游记研讨会也未能举行。

《西游记》研究是所有研究《西游记》学者的权利，已经张罗起来的学术工作不能也不该半途而废。为此，淮海工学院与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有同志商量，决定成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西游记》研究分会(筹)，团结全省的西游记研究力量，推进江苏省的西游记文化研究，进而推动整个西游记研究事业的发展。此事得到了江苏省社科联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担当无疑是这个分会(筹)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

至此，我不能不多说几句：作为淮海工学院的党政领导是有学术远见和学术责任心的，院长晏维龙教授和分管院长姚东瑞研究员亲自部署并主抓这项工作，他们为西游记文化研究的学术繁荣，为推进连云港乃至江苏文化建设百折不回的精神令人钦佩，并给西游记学界的同志们以极大鼓舞与振奋。

由此，又让我想起在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与连云港市社科联2002年共同举办的《西游记》研讨会上，时任中共连云港市委书记、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的王国生同志的讲话：连云港的领导同志，要支持《西游记》学术研究工作，支持《西游记》学术研究，也就是间接支持连云港的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建设。记得那天下午，王国生同志将要赶到省委开会，上午还特地到会聆听专家的发言，令所有与会专家十分感动。后来他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在省政协八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还论及那次研讨会，谈到学术研讨对经济文化开发虽然间接却又影响巨大。我想，我们的领导若都具有如此眼光和担当，《西游记》学术的繁荣局面定将出现。

因为有了他们，当然更由于有广大《西游记》研究者的努力，于是就有了在淮海工学院召开的这次《西游记》研讨会，于是就有了这本《西游记文化论丛》。《西游记文化论丛》可以说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所编《〈西游记〉研究》一书时隔20余年的继续，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自1982年以来所开《西游记》研讨会时隔20余年的延续。至于《西游记文化论丛》的学术水平如何，那是要读者诸君去评论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而且还是开了个好头！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努力，《西游记文化论丛》定会越出越好，这是可以期待的。

2009年10月6日

序二

叶君远

“2009年西游记学术研讨会暨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西游记》分会(筹)成立大会”日前在连云港淮海工学院隆重召开,《西游记》研究界的众多名家和新秀齐聚一堂,各抒高见,发表了许多研究新成果。会议的组织者从所收论文中精选出若干,编成了这部《西游记文化论丛》。

《西游记文化论丛》所论,涉及《西游记》作者、版本、主题、人物形象和文化内涵等,都是新世纪以来《西游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西游记文化论丛》的重头戏是西游记的文化研究。《西游记》是一部累积型小说,儒、道、佛以至于民间宗教等,诸家杂陈,兼容并包,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和丰富。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探索其思想文化内涵,便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西游记文化论丛》中多篇论文,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较以往更为深入的开掘,有的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人类原初时期的自然、图腾和灵魂崇拜的思想,有的阐述了书中的佛家思想,有的论及书中的道家、道教思想,有的阐发了取经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人类群体奋斗的精神,有的分析了小说中反映出来的与商品经济相关的具有近代“启蒙”性质的个性精神,有的论述了其中反映的民俗制度,等等。这些论文必将推动西游记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西游记》的版本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西游记文化论丛》中的论文,或对目前国内罕见的明代版本——闻斋堂本《西游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与现存明代诸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考索;或对《西游记》诸多版本之来源重新进行考述;或对“人民文学本”《西游记》的文字进行校勘;皆甚见功力。至于技术层面上的《西游记》版本的数字化,对《西游记》的研究,无疑亦有重要作用。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研究,《西游记文化论丛》呈现一种诸家争鸣的态势。除却传统的“吴承恩说”,有的提出“唐顺之说”,有的则认定《西游记》最后定稿人为“华阳洞天主人”,并坐实为“茅山全真道士闾希言师徒”。当然更多的论者仍然是“吴承恩说”的坚定支持者,有的文章便对《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述。以上论文,虽各执一词,然无不力求发言有据。目前看来,这一问题虽暂时难以彻底解决,或达成一致见解。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思路,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从这一角度看,众说纷纭未必是件坏事。

《西游记》的人物形象、情节、艺术风格以及《西游记》的传播情况等方面,也依然是

研究的关注点。《西游记文化论丛》中的论文,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了有益的探讨,不再一一叙述。

研究述评、研究史的梳理和对研究者的研究等,对《西游记》研究也是必要的。对于《西游记》研究、研究史的梳理、反思或展望,是《西游记》研究深入的重要表现和必要途径,尤其是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新理路等的阐述,无疑对《西游记》研究的发展又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西游记》研究思想的分析和对研究者身份的考证等,则是对《西游记》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拓展,等等。

《西游记文化论丛》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有从宏观上的整体把握,也有微观上的文本解读;有高屋建瓴式的理论观照,亦有细致入微的版本考索与文献考订。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得到运用。大多数论文逻辑严密,自成系统,言之有据,叙述严谨,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西游记文化论丛》的编辑出版,作为《西游记》学术活动的一部分,对连云港区域的文化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直以来,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人们常常提及的话题。一般来讲,无论民族的救亡图存,还是复兴图强,不论是在过去,抑或是在今天,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古典文学又成为“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资源,成为确立新的中国文艺美学传统的历史基础,对它的研究也开始了又一个新的时期”(赵敏俐:《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导论》,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古典文学研究,在今天,已然成为继承优良传统,服务民族的新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

目前,在全国兴起的发掘区域文化资源,打造区域文化品牌,是传统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方式。作为孙悟空“老家”的连云港,打造“西游”文化品牌,将连云港地区和花果山变成西游记空间实体性的“媒质”,无疑是传统服务现代的极为有效的方式,它对于区域文化的建设、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提高,乃至对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加快以连云港为龙头的江苏沿海地区开发的强势推进,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而每年连云港市“西游记文化节”的举办,《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西游记研究”专栏的设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西游记》研究分会(筹)”和淮海工学院“西游记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西游记学术会议的举办,以及此次论丛的编辑出版,都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西游记已经和连云港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游记的学术研究离不开连云港,连云港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也离不开西游记。深信西游记学术研究的发展将更进一步提高连云港的知名度,有力促进其现代化建设,而连云港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反过来也将使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并且使得这种研究具有了实践的品格。

2009年10月20日

目 录

- | | | |
|----|-------|--------|
| 序一 | | 萧相恺(1) |
| 序二 | | 叶君远(3) |

西游记文化探寻

- | | | |
|---------------------|-------|---------|
| 对《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 | 竺洪波(1) |
| 《西游记》的民族文化融合渊源及文学取向 | | 许并生(14) |
| 略论“文学的文化研究”视阈下的西游记 | | 张锐载(23) |
| 《西游记》洞穴母题诠释 | | 萧 兵(31) |
| 《西游记》中神仙思想透析 | | 周 倒(34) |
| 《西游记》与拜石文化 | | 齐慧源(39) |
| 西游神话：独舞抑或合唱 | | 张兴龙(45) |

人物形象与艺术

- | | | |
|--------------------|-------|-------------|
| 孙悟空人生历程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意蕴 | | 曹炳建(55) |
| 试论孙悟空和他的紧箍 | | 刘怀玉(66) |
| 猪八戒的傻女婿形象特征评析 | | 韩希明(76) |
| 论“五圣成真” | | |
| ——个性精神的赞歌的文本成因 | | 程日同(83) |
| 试释孙悟空之姓名 | | |
| ——兼及《西游记》之主旨 | | 戴 健(92) |
| 从神魔特点看《西游记》的情节与线索 | | 张玉梅 张祝平(98) |

版本与校勘

- | | | |
|---------------|-------|----------|
| 论闽斋堂本《西游记》的底本 | | 吴圣燮(105) |
|---------------|-------|----------|

《西游记》原作和改本的流变

- 《读陈元之序——〈西游记〉作者考论》之五 胡令毅(114)
《明刊〈西游记〉汇校》举隅 李洪甫 李熙 沈海玲(126)

考释与比较

- 论明清时期的齐天大圣崇拜 苗怀明(139)
吴承恩、归有光长兴狱案始末 蔡铁鹰(149)
再论《西游记》最终定稿人是明代茅山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
——对《西游记》第一回有关阎希言身份隐喻暗示的部分破译 胡义成(157)
简论《西游记》与《红楼梦》谐谑风格的雅俗两趣 徐乃为 郭曼(170)
《西游记》的诠释与过度诠释 龚际平(178)
世本《西游记》的最早拥有者“唐光禄”考 邢慧玲 邢琎(185)

数字化研究

- 《西游记》版本数字化及应用 周文业(191)

研究综述

- 《西游证道书》评点研究及黄周星的道士身份 赵红娟(212)
“神魔”、“神话”二说之起伏消长
——“西游学”史片面观 石钟扬(224)

- 后记 (231)

西游记文化探寻

对《西游记》文化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 竺洪波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游记》论坛兴起了一波文化研究的热浪,其间潮起潮落连绵不绝,至今依然方兴未艾,其烈度和持久性在整个《西游记》研究史上都属空前。究其缘由绝非偶然:除却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包括学术)潮流的推动,直接的动因则在《西游记》研究的内部张力和学术传统。随着《西游记》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版本嬗变等学科基础命题取得许多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全面展开旨在发掘作品深层次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揭示《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和文化史上地位的“文化研究”,犹如水到渠成。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审视这一学术潮流,其影响和意义都会凸显出来,那种论题广阔、争论纷呈、新见迭现而富有生气的学术面貌,多元、深入、强势的学术形态特征,还有在各派研究中——主要是神话原型批评、童话学批评、审美文化研究、宗教文化研究诸方面——取得的实绩,都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反响,至今仍然具有令人振奋和回味之感。当然,毋庸置疑,作为一股汹涌的学术潮流,难免泥沙俱下,良莠糅杂,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存在问题亦多,缺失和谬误也不鲜见。据此可知,对《西游记》文化研究尤应作必要的总结与反思。

一、神话原型批评:视角新颖而难免枘凿之隙

首先呈现文化研究流向的当推神话原型批评。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

(神魔)小说,从艺术精神上与远古神话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化研究由神话原型批评发端是顺理成章的。神话原型批评是现代西方特有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方法,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和弗雷泽的“仪式派”人类学思想,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则被视为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谓原型,其特点即是在神话中搜寻具有原始性和模式性的文学意象。荣格的解释最有普遍性,他认为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是一切心理反应的普遍一致的先验性形式,也即“由各种遗传力量形成的一定的心理倾向”;而保存着人类丰富原型资源的文化载体便是神话,“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① 弗莱则把原型界定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母题或“一些联想群”,并从远古神话中归纳出四种基本原型:诞生、死亡、胜利、毁灭,并分别用春、秋、夏、冬四季作为象征性指代,而其他丰富的神话原型都由此派生而出。^② 这种神话原型批评意识最早在萧兵和蔡铁鹰的系列论文中呈现出来。他们借用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神话原型批评的概念和方法,对《西游记》的神话本体进行全方位审视,声称要“还原”作品的本来面目,揭示其潜在的“原逻辑”。萧兵认为《西游记》、《封神演义》一类神话(神魔)小说的最大特征是其作为再生态神话,以神话思维的形式“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天真解释”^③。蔡铁鹰则广泛搜集中国远古神话、民族图腾、祖先传统和民间曲艺来探寻孙悟空的原型来源,以及取经故事成于西域的奥秘,揭示出《西游记》的“文化归属、文化内涵和成书之谜”^④。

神话原型的引入无疑为《西游记》文化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对《西游记》的文化意蕴渐次提出了一些与传统理解截然不同的新见解。如有论者将《西游记》的原型模式归纳为“儿童犯错→严酷考验→成年命名”,意即心智不成熟(犯错)的儿童经过严酷考验和寻求历程进入佛社会(人类社会的象征),作品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一个“远古成年礼”的原始意象。^⑤ 与此相关,又有论者提出了原罪说,也即将功赎罪说,认为唐僧等人在开始取经征途之前就已先验地犯有“原罪”,九九八十一难就是赎罪消业的过程,具体说,唐僧为不听如来说法的罪过赎罪;孙悟空为大闹天宫的弥天大罪赎罪;猪八戒为调戏嫦娥的流氓行径赎罪;沙和尚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玻璃盏的罪过赎罪;小龙马为纵火烧了西海龙宫的一颗夜明珠的罪过赎罪。据此,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7、120页。

^② 王宁等:《弗莱研究:东方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③ 萧兵:《〈西游记〉——文化开放的象征:兼论泛西域猿猴传统》,载《淮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2期;《〈封神演义〉的拟史诗性及其生成》,载《明清小说研究》1982年第2期;《盗火英雄:夸父与普罗米修斯》,载《活页文史丛刊》;《楚辞与神话:西王母以猿猴为图腾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蔡铁鹰:《猴行者与古羌人的氏族图腾及祖先传说:孙悟空形象探源之四》,载《宁夏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元明之际取经故事系统的流向和影响——孙悟空形象探源之三》,载《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1期。

^⑤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载《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又见《文学人类学批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西游记》的原型模式可概括为：“犯罪—赎罪—上西天（解脱）”^①。这里要指出，这个观点还接纳了西方神学（如基督教）的思想资源^②，作为一种《西游记》主题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应该说，这些神话原型批评的个案解剖，有意识地将《西游记》与原型意象对照得十分详细，实际上也阐释了某一种特定的文化蕴含，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形成了可为后来者依循的范式。纵观以后的许多同类研究，其共同点是：以荣格、弗莱、弗雷泽等人的原型理论为依据，将《西游记》视为神话本体，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远古原型意义。它的另一个意义是将研究指向作品的深层结构，无论是“儿童犯错—严酷考验—成年命名”，还是“犯罪—赎罪—上西天（解脱）”，作为原型模式和原始意象，相对于西天取经的情节框架，都是一种隐含的内结构，一种“看不见的文化逻辑”。如果这种显在和隐性的“双质结构”——现代西方文论称为“复调和声结构”——的阐释合乎事实，那么《西游记》将具备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的“先锋性”，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都需重新评定。

问题在于，神话原型批评的对象是上古神话，它所揭示的原型是原始先民的情感和思维，荣格称之为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从来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获得过”，它只通过遗传而积淀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保留下来的文化载体唯有远古神话。^③ 所以卡西尔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谎话，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一种普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④。进入文明时代，神话理应灭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也说过这种思想）。《西游记》是再生型神话，继承了中国远古神话的形式，在艺术精神上则虽有相通相关联的线索可寻，但已经发生质变，它并非是朦胧的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它的大旨其实不在“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天真解释”，因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已趋于成熟（科学解释），而是运用神话这一艺术载体再现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情感、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只是这种“再现”是隐晦的、折光的、变异的而已。正如鲁迅指出：“（《西游记》）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现在早已明确，《西游记》中的妖魔故事都有所指称，虚化一点是指人类前进中的诸多精神和物质的障碍（魔障），说实了即指宦官专权、特务（东西两厂）横行、皇亲特权、唯道独尊（妖道惑众）、文豹隐雾（假隐士）等明代严重的社会矛盾，两者都不是通过遗传积淀在人们记忆里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或原始意象，而是异常清晰和强烈的现实感受，所谓“荒诞诞说鬼，真真切切说人”。这就意味着，神话原型批评与《西游记》

① 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载《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② 余国藩：《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载《中国时报》（台北）1973年12月13日。

③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94页。

④ 叶舒选：《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的对象性关系难以完全确立,它提供了观察对象的新视野、新方法,但在实际的解读中很难把握准确,直指其中的文化鹄的。从上述提到的一些研究结论来看,新则新矣,但方枘圆凿,间隙分明,甚而有无的放矢之嫌。

我们看到,后来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一文对此有所匡正。我曾将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于1995年第1期隆重推出的长文认定为《西游记》神话原型批评的最高成就,正是基于它在神话批评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和改进。它观察《西游记》并未专注于所谓的原型,而是以更为宽泛的“神话文化”替而代之。作者说:

“神话文化”是一个比原始神话信仰更宽泛的概念,它考虑到中国神话以及神话因素的驳杂、散落和在民间信仰中的广泛渗透性、历代文字记录的零碎性,明显地具有与西方史诗神话不同的形态、命运和发展历程。在早期的《山海经》时代,它黏附着山川地域的因缘,具有与史诗神话迥异的非情节的、而是片断的,非英雄主义的、而是多义性的形态,具有更为充分的初民性和原始美。其后它又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贬抑,散落于志怪书和民俗传说之中,并在宗教潮流的裹挟下,参与建构神谱。谁又能够想到在我国近古的“三教归心”的潮流中,它又涉取了千年宗教发展的智慧而超越具体宗教的迷执,以超宗教的自由心态焕发出宏伟绮丽的神话想象力,并以《西游记》代表了我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如此对中国神话文化的鉴别和界定,实际上体现了对《西游记》神话特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既认识到它与原始神话的本质区别,也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在此基础上,杨义进一步指出,《西游记》是借用神话思维创造出来的,通篇充满“神话隐喻”,作为中国神话的大器晚成之作,其超越远古神话,“堪称独步的地方,是在个性神话中增加了‘哲理—心理’的复调。它发掘着个性深层的精神意蕴,借神话故事思考着人的主体,思考着人的心性,思考着人的信仰、意志和生命力。即是说,它寻找着人的精神历程的神话原型,使神话成了精神哲学(或心学)的隐喻”。所以,《西游记》的意义“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它“以小说的形式把我国神话文化的形态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它是我国一部“神话文化的伟大杰作”。注重神话本体研究,并将其纳入中国神话传统,肯定其神话文化的历史内涵,这对于《西游记》文化研究不啻有一种返璞归真、拨乱反正的意义。

这就启示着:展开《西游记》神话原型研究应遵循一个理论前提——将《西游记》的神话再生性特征与原始神话区别开来,并寻找到两者神话精神(并不是仅仅指神话外壳的相同)上的联系,从而避免对《西游记》文化原型模式的解释沦为纯粹的理论预设和抽象的教条,确保这一研究言之有物,契合文本实际,充满理论的活力。这里不得不说,当年鲁迅、胡适、陈寅恪、郑振铎,还有后来的季羡林、金克木等学者从中西神话传统来探求孙悟空的原型依据,其过程和结论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童话学批评：学术的美化与矮化共存

与神话原型批评密切相关，并为《西游记》文化研究带来新气象的是童话学批评。运用童话学视角审视《西游记》，体现出这部奇书得天独厚的学术品质。相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其他经典小说，这实在是《西游记》的荣幸，因为它拓宽了学科视界，丰富了研究领域。童话是美的结晶，童话学研究赋予了《西游记》无穷的美感，在一定意义上也把学术研究“美化”了。

把《西游记》视为一部童话作品，源于胡适，他不仅称之为“神话小说”，也称之为“童话小说”，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所作的《〈西游记〉考证》中称：“(《西游记》)正如英文的《阿梨思梦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虽然含有很有意味的哲学，仍旧是一部极滑稽的童话小说。现在有许多人研究儿童文学，我很郑重地向他们推荐这七回天宫革命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袁圣时于 1948 年作《〈西游记〉研究》(刊于《台湾文化》1948 年第 3 卷第 1~2 期)明确说：“今观《西游记》纵恣谐谑，独逞胸臆，其调诙之所及，至于仙佛同仁，神魔一体，其他神话小说中固未见有此种格调也，故吾曰，谓之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童话小说，宁非尤宜。”现有的几部《中国童话史》都列有专章作重点论述，或称为“一部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准童话”，或誉之为“瑰丽璀璨的长篇童话”，对《西游记》的童话艺术性都有详细的论述。

一场关于神话与童话的辩论确立了《西游记》的童话本质，也揭开了新时期《西游记》童话学研究的序幕。1984 年，白盾发表《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一文，根据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论断指出：“希腊民族是有别于‘早熟的儿童’和‘粗野的儿童’的‘正常的儿童’，是‘人性开展得最美好的幼年时期’。因而，他们创造的神话和史诗‘所产生的魅力’，正来自那些使人‘感到愉快’的‘儿童的天真’。”认为“神话就先天地带有童话的基因，因为它们均在不同方式上反映出‘儿童的天真’”。而《西游记》最大的特征在于“神话与童话的交融”^①。文章随即遭到质疑。许多论者指出，将神话与童话混为一体不符合艺术逻辑，也不符合《西游记》的实际。如汪瑰曼最先在《光明日报》发表商榷文章，指出马克思以“儿童的天真”论述古希腊神话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该胶柱鼓瑟，作“实在的、刻板的理解”，《西游记》固然具有神话与童话交融的特征，“但这种交融不是由于神话先天带有的童话因素的隔代遗传，而是因为《西游记》本身就不是神话，而是作者的创作，是神话、历史和传说的故事糅合”。所以，“吴承恩不可能新创神话，只能以神话、历史和传说为原料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童话式的小说”。在详细论述童话与远古原始神话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汪文明确肯定《西游记》为童话作品^②。

可以看出两点：①这场争辩其实质是围绕神话与童话的认识，也可以把《西游

^① 白盾：《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载《光明日报》1984 年 5 月 8 日。

^② 汪瑰曼：《也谈〈西游记〉中神话和童话的交融》，载《光明日报》1984 年 6 月 26 日。

记》看做是神话小说抑或人魔小说之争的进一步延伸;②双方虽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古希腊神话的论断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致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式的小说”,或“具有童话的若干特征”,并且公认《西游记》的永恒魅力正源于“儿童的天真”,“神话与童话的融合”。客观地说,前一问题涉及原始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关系,两者确有区别,也确有联系。《西游记》无疑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又具有被历代少年儿童喜爱的事实,其作为童话作品的本质定位是可以得到确认的。但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也无疑保存着华夏民族远古神话的丰富资源,所以很难说它一定不是神话小说——现在我们用“再生型神话”来概括,应该说是恰当的。

《西游记》童话学批评在林庚的专著《西游记漫话》中得到充分体现。他首先阐述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与明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潮“童心说”的关系,指出李贽等启蒙思想家贯彻“童心说”的精神,最终而不免于人生的失败,可是,童心作为一种理想,又可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这就是《西游记》中天真烂漫的童话精神的由来,是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的一个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游记》正是体现了明代中后期激进文人精神解放的浪漫追求。”

接着,林庚比较全面、具体和深入地论述了《西游记》童话精神的实质和内涵。他指出,正是童话精神使《西游记》与远古神话和一切成人小说相区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伟大名著:它从“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以“儿童的模仿的天性与天真的想象”作为反映和评判的“心理依据”,并且保证“将全部的兴趣投入到一个动物世界”。他认为这直接赋予了作品乐观、快乐的精神情调,“因为童年并不知道什么真正的悲哀,它陶醉在不断生长着的快乐中,为面向无限的发展所鼓舞”,“而童年的世界又是自由的、未定型的,显示着无限发展的潜力与可能性”,从而享受着“无尽的快乐”。他还重点解剖了孙悟空的形象,以为其“活泼充沛的想象与自由不羁的性格”,他“从来都有那样好的兴致,那样乐观的心情”,只有在童话精神的观照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孙悟空的完美形象构成了《西游记》童话精神和童话逻辑的集中体现。

对《西游记》进行童话学研究,其优势和实绩都很明显,但其中也隐含着自身的危机。那就是:童话是主要的儿童文体,“童”即指儿童,“话”就是故事,童话即是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故事,把《西游记》界定为童话——即使是“一部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准童话”和“瑰丽璀璨的长篇童话”之类的高度定位——也无疑把它作为文学巨著的主要价值筛漏掉了。对《西游记》的童话学研究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同时,也使得学科品位遭到削弱,从而必然地导致学术的矮化。《西游记》为历代少年儿童所喜欢(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作品),但对《西游记》的研究相比较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其他小说经典则一直处在后进的态势,这一反差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

有必要引入大童话的概念。根据心理学(如皮亚杰和马斯洛)的观点,儿童的视角是向上的,他们渴望成长;而成人的视角是向下的,具有返璞归真、追求“第二次天

真”的“健康的儿童性”的发展趋向^①。这两种心理取向的交融使童话具备了“双读效应”，大童话——主要是为成人创作的童话——也由此应运而生。据目前资料，“成人的童话”这一概念由华罗庚在1979年评价新武侠小说（梁羽生《云海玉弓缘》）时提出，并随即成为被广泛认同的文学观念。因为这一类作品确实具有广泛的成人受读性，“它给成人营造一个非现实的可供卧游的天地，它有转移和调适心理的功能，消解疲劳和紧张”^②。同时，华罗庚作为数学家超越了常见的文学流派和观念上的偏见，他的理性优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无疑，“大童话”观念有可能打破传统童话既有的偏窄边际，从而也相应地克服《西游记》童话研究存在的危机，包括儒、释、道等哲学思想在内的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将得到整体性的包容，不再被固有的童话性视野所遗漏，《西游记》童话学批评也必将产生新的活力。

三、审美文化研究：论题广泛而亟须突破

审美研究一直是《西游记》文化阐释的一大重点。艺术是审美创造，《西游记》是这种审美创造的结晶，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最贴近《西游记》本体的学术流向。但是众所周知，在一个相当长的“非常化”时期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阶级论主题观和庸俗社会学的流行，《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中断的。

进入新时期，《西游记》研究最早透露出审美文化趋向的是李欣复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4期上的《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一文。当时，《西游记》论坛已有何满子率先发表的《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等文章，历数《西游记》主题研究中“硬划成分”、“强派角色”等弊端，呼吁《西游记》研究打破庸俗社会学的“框子”^③。李欣复则从审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对此现象作出积极的反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统观各家意见，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都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现实世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反映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生活。我认为，文艺虽然归根结蒂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它是审美意识，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意识的独特个性和表现方式。因而不能用统一的模子去剖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明确肯定“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主题思想是其主要审美认识价值所在”，吴承恩的伟大之处是不仅“在文艺史上创造了一部杰出作品”，而且“还为检验各种文艺和美学理论科学的真理性树立了一种主要的标尺”。现在看来，对于《西游记》审美研究，该

^① 马斯洛：《存在心理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② 王先霈：《文学理论基础的广泛性与本土性问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何满子：《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载《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载《西游记研究——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文虽然难当典范之作，却无疑有首倡之功。

我以为这一时期《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方面的第一篇力作是姜云的《〈西游记〉：一部以象征意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一文。姜云首先对在传统的研究中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来评价《西游记》提出了质疑。因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不能全面概括和反映它的总体艺术特色”，而且还有可能过滤掉作品原本异常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接着指出《西游记》最大的美学特征是象征主义，“用借此喻彼、假象见义的方法，巧妙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对现实的批判”，整部《西游记》“是一种象外之境，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它表面写的是这件事，实际却暗示另一件事”，因而具有“暗示性、借喻性、象征性”^①。

这篇文章的价值，是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整合为象征主义，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实际上已被“溢化”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象征主义，其反拨、匡正的意义显而易见，它摆脱了政治性主题观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哲理性主题观，更加贴近了《西游记》的审美实际，并且以其周详的审美分析和成果推动了新时期审美文化研究。从此以后，《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纵观《西游记》审美文化研究，呈现着空前热烈、持久的局面，不仅论题广泛，涉及《西游记》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方方面面的艺术创作问题，而且论文数量庞大，声势壮观，其中也出现了李欣复《也谈〈西游记〉的审美认识价值》（《文史哲》1983年第4期）、孙逊《〈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意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吴圣昔《涉笔成趣 妙在自然——论〈西游记〉的诙谐性》（《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刘耿大《西游记迷境探幽》（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张锦池《论沙和尚形象的演化》（《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等高水平、有影响的论文和论著，当之无愧是《西游记》文化研究中的主流。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审美文化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欠缺，亟须修正和突破。

应先予指出，审美文化研究并非指单纯的艺术分析，而是将《西游记》作为完整的审美对象，一个特定时代审美实践和审美文化的历史积淀，运用美学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论，从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关系上，从艺术现实和理论透视的结合上来审察、阐释《西游记》无比丰厚的审美文化内涵——作为人类审美领域的不断展开，它凝结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不同的审美形态；作为在人类审美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它表现为崇高、和谐、悲剧、喜剧、荒诞、丑丑等不同的审美文化类型，而从这两个系列的整合中，则呈现出一定历史时代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时尚（潮流）等——这些恰恰是对《西游记》审美文化的真正认定和确证。

以此对照，我们的审美研究实在有失纯正，许多具体分析艺术细节问题的文章给人零碎丛脞、肤浅谫陋之感，甚至很难说真正具有审美研究的意义，为学术界诟病的

① 姜云：《〈西游记〉：一部以象征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载《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